

关于我国教育问题的再思考

Thoughts on China's Education

蒋显军

(湖南永州第五中学, 高级教师 永州 425000)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在于: 一方面必须充分满足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和各级各类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还要求教育体系自身必须具有很高的效率, 即在教育投入一定的前提下, 能实现其最大产出。教育适应经济发展又有主动和被动之别。被动适应强调根据社会经济现有水平办教育, 把教育发展寄托于经济的发展。主动适应在于教育投入超前, 以此来带动经济发展, 它注重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教育是一项周转期长的事业, 只有根据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超前投入, 才能求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这方面, 日本、前西德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等国家和地区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

日本、前西德和亚洲“四小”等国家和地区, 其经济发展的起点水平与我国较为接近, 都是从二战后的废墟上开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在短期内跃居世界经济前列, 原因就在于他们准确把握住教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在大量引进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同时, 充分发挥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能动性, 从各自的国情出发, 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教育兴国之路。纵观这些国家和地区二战后教育的发展史, 不难发现, 其教育的发展有着以下特点:

1. 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

二战以后, 这些国家和地区首先振兴的是教育, 可以说是“勒紧裤带”办教育, 甚至利用外资办教育。年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由于对教育的巨大和超前投入, 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等教育早在 70 年代末已基本普及, 前西德更把义务教育的年限由 9 年延至 12 年。高等教育方面, 日本和前西德目前的适龄青年的入学率分别为 30.7% 和 34.5%, 亚洲“四小”也已达到 20% 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 正

得益于教育的超前投入。

2. 发展程序由低级向高级递升

例如日本, 60 年代以前教育投入的重点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每年用于这方面的经费在全年教育总投入中所占比重高达 51%。60~70 年代教育投入的重点是普及高中教育。至 70 年代末, 高中教育已基本普及, 才把投入的重点转向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 又以深受企业部门欢迎的短期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优先, 随着经济发展对人才层次的要求不断提高而走向综合。教育发展程序的这种递升性与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是相适应的。

3. 教育管理实行分权制

分权制是日本和前西德教育管理的一大特征。日德的教育管理曾发生过两次分权。第一次是中央与地区分权, 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初期。日本废除了中央集权管理教育的体制, 改由地方分权管理教育。前西德更把地方分权管理教育写进了作为联邦宪法的《基本法》。分权制下的地方教育委员会拥有设置学校、安排课程、任命学校工作人员的权力。分权制的实行, 对在战后初期极困难的条件下重建学校和进行教育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二次分权发生在 60 年代, 中央与工商界、社团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分权。分权是由政府、工商界和社团组织董事、评议会和各种咨询委员会来实现的。工商界和社团拥有参与教育宏观决策、制定学校大政方针、学校专业和课程设置、质量评审和证书认可的权力。高教管理分权制的实行, 实质上是把高等教育的发展置于市场机制之下, 使教育的结构、布局以及教育的内容与经济发展的需求更加吻合。

4. 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相适应

日本、前西德以及亚洲“四小”等国家和地区对教育内容的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质量要求和人才的需求结构进行的。日本自 1951 年起, 产业界便通过各种形式提出调整教育结构, 改革教育内容, 使之适合于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适合于日本国情的要求。政府在历次编

制经济发展计划时,也都相应地把教育调整、改革和发展纳入计划。这些国家和地区教育内容对市场需求的适应性表现在:一是教育的指导思想突出人的个性解放,注重于人的个性的多方面发展。这与市场对人才的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客观要求是相对应的。二是通过改革与调整,逐步形成了与市场对人才需求结构相吻合的教育结构。如日本的“金字塔”结构。前西德的“方阵交联”结构。三是极为注重职业技术教育。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以技术应用为主,职业高中和高等专科学校在校学生数与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之比接近于1:1,初级中学和普通高中也开设了职业技术课。前西德的高等教育中,纯学术性高校只占30%,普通高中也只占高级中学的30%,其余均为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校。前西德政府还明确规定,凡不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初中毕业生,都有接受2~3年职业技术教育的义务,并为此将义务教育年限由9年延至12年。

5. 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发展教育必须有充足的经费。日本、前西德和亚洲“四小”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经费来自于国家、地方政府、工商界、社团和私人等多种渠道。地方政府筹措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地方基础教育的发展。工商界、社团和私人筹措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高、中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如韩国三星企业集团每年投资于这方面的经费多达2 000万美元。国家财政中教育的拨款则用于发展基础和尖端学科,并协调各级各类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保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教育的顺利发展。

二

与日本、前西德和亚洲“四小”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相比较,我国教育发展的最突出特点是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被动性。

1. 教育投入不足使经济发展后劲乏力

我国每年教育总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低于4%,屈居于世界各国的倒数几位。教育发展了几十年,九年义务教育至今未能普及,甚至有相当比例儿童不能完成初等教育。农村教育状况更令人担忧,教育设施和教学设备还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小学教师中民办、代课教师仍占40%,师资平均水平偏低。某些地区的教师待遇不是上升而是相对下降,甚至公费医疗也难有保障。近年来又发生了严重的拖欠工资现象,部分教师生活难以为继,无心思教。学生则以每年10%的比率流失。教育落后使我国人力资源的素质长期不能提高,以致日、德和亚洲“四小”等国家和地区早已把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时,我国仍在扩大资本和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上下功夫。

2. 发展程序紊乱导致了畸形的教育结构

我国教育发展程序紊乱,主要表现为不顾社会经济的现有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而盲目攀高。与薄弱的基础教育相比较,高等教育的发展则显得过快和过滥。日本是一个早已普及中等教育的国家,其高教经费也只占教育经费的22.5%,而我国的中等教育远未普及,高教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却高达25%。高等教育的发展又盲目追求高层次和大综合,这种头重脚轻的教育结构,一方面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广大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大批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过剩,造成教育经费巨大浪费。目前我国具有本、专科学历的高级人才的专业对口到位率不到70%。

3. 教育布局规模过大致使教育效率低下

我国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被动性还表现在教育布局高度分散,教育网络覆盖面宽而网点规模过小。布局高度分散使得师资、设备、经费投入也处于高度分散状况,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中等教育如此,高等教育也是如此。目前整个教育网络的师资配备和设施状况与现代化水准差距甚大。而国家每年用于教育的财政拨款仅能维持现有网络运转。由此可见,这种高度分散的教育布局与我国国民经济承受力是不相适应的。因高度分散而导致的低质量教育网络与“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这一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不相适应的。与此同时,教育布局高度分散又造成十分有限的教育经费的巨大浪费。这种浪费主要表现在教职员工的相对过剩和设施利用率低。目前我国中等教育的在校学生数与教职员工数之比为10:1左右,高等教育为5:1左右,比率之低实为世界各国罕见。这种浪费还将随着现有网络建设水平的提高而扩大。

4. 封闭式管理体制割裂了教育与科技、经济发展的联系。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使教育、科技、经济三部门逐步形成三个关联甚少的条块。产、科、教的条块分割使得科技部门科技成果大量搁置,不能迅速通过教育转化为生产力,而产业部门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信息又不能及时准确地反馈到教育部门,导致人才供求的脱节。在封闭式教育管理体制下,整个教育部门几乎变成了一座大的“经院”,教育内容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知识结构僵化,指导思想是教育、分数、升学一条线,而不是以培养学生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能力为目的。学校根据国家下达的计划办学,培养的学生推给国家安排就业,无论成绩优劣,无论社会是否需要,都可以端上“铁饭碗”。在这样一种封闭体制下,教育部门既无改革的动力,也感受不到不改革的压力,以致人才供求错位现象严重。

5. 经费来源单一直接影响着教育的进程

办学经费,国家虽然一直强调要“两条腿走路”,而事实上却基本上是国家一条腿在走。多年来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统包,用人单位和受教育者没有为教育付出任何直接的代价。中等和初等教育领域,近年来虽然作了一些改革,如办学权逐级下放,经费层层包干,等等。但是,由于政策法规没有跟上,对地方教育的发展缺乏定期的目标和考评的指标体系,没有把教育发展的状况列为地方政府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因而造成一些地方政府挪用教育经费的现象发生,甚至国家计划内教育经费也难以到位。贫困地区如此,经济发达地区也有这种现象。

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大教育意识。要树立与之相适应的大教育意识,首先必须克服那种“等经济发达了再来办教育”的旧观念。我国教育落后,与这一旧观念的误导不无关系。美国靠富集世界优秀人才而强盛,日本靠科技与教育而发达,中国靠什么?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或靠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不错,当前外资正是因此而投放到中国。但是中国的自然资源终有耗尽的一天。中国劳动力价廉是因为它包含的教育投入量少,培养费低,这种优势也将随着世界性的科技进步而消失。剩下的只有广大的商品销售市场,而这一“优势”很可能把中国置于被动的风险地位上。所以,被动的教育观一日不去,中国教育将一日不兴。教育不兴,经济岂能发展?其次,我国教育的畸形结构和不合理布局是在“急功近利”、“好大求高”的“左”倾思想长期误导下形成的。要使我国教育返回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轨道上来,还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彻底去除那种“一厢情愿”、“想当然”的主观意志,确立起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质量意识和效率意识。并以此来指导当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和教育网络。鉴于当前教育的结构畸形和布局高度分散的状况,应把增加投入与调整结合起来,通过增加教育投入,使结构和布局逐步趋向合理化。目前我国教育结构的薄弱环节在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基础和尖端学科这两头。基础教育上不去,人力资源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和尖端

学科上不去,就意味着我国将失去现代科学技术之母。因此,增加教育投入,首先必须保证这两方面迅速发展。而以技术应用和管理为内容的高等教育以及中等专业教育,则应本着“谁受教育谁出钱,谁用人才谁出钱”的原则,将其推向市场,让市场需求优化其结构和布局,通过市场竞争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这样做可以使人才供求趋向一致,避免人才供求错位造成的教育经费巨大浪费,有利于科学技术是商品观念的形成,有利于全社会尊知重教之风的形成。

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还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大教育机制。而建立大教育机制,关键在于要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管理。就当前教育状况而言,国家应逐步地分阶段分批次地把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从其主管部门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主体。独立后的学校应拥有以下自主权: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状况设置专业和课程,确定学制,制定招生计划;向受教育者、用人单位以及面向社会筹集经费;根据自有技术和智力优势结合市场需要组织课题研究,发展自有技术产业;与企业直接进行技术转让、人才交流、合作开发与联合攻关,直至组成集产科教于一体的企业集团;同类学校同类系科可以互相协作、互相联合、互相兼并,等等。为创造一个使产科教趋向一体化的外部环境,国家政策应作如下变动:国家财政用于高教的经费适当削减,改过去的经费包干为经费调控;国家不再向学校下达招生计划,不再包揽毕业生就业,学校直接面向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招生,用人单位和企业根据实际需要择优录用;国家设立集产科教于一体的机构,专司指导和协调产科教三部门一体化。新的机制下可能出现的形势是:办学形式会呈现出灵活多样,不再局限于旧有的模式;产科教三方寻求联合的主动性大大增强,联合的结果将会产生一大批集三者于一体的企业集团;同类学校、同类系科互相竞争和互相兼并的结果,将产生一大批实力雄厚、各具特色的学校和系科,淘汰一批名实难符的学校和系科,教育结构和布局将被优化,教育质量将大大提高;由于高教经费部分向基础教育转移,基础教育发展的步伐将会加快。高教改革还会带动基础教育的改革,一改当前为分数、为升学而教育的状况,自觉转向为提高学生素质而教育。

(责任编辑 肖庆山)

重要更正

本刊1994年第3期(总第69期)第6页右栏倒数第15行最后“国家科委”应为“国家教委”,特此更正。

编辑部